

《四库全书总目》的小品批评

——以明代子部提要为中心

何宗美

内容提要 考察小品渊源与内涵，足以为小品史研究之借鉴，通过揭析“清谈”“澄怀”“闲适”“幽赏”“游戏”等精神要素，小品内涵借此可明；批判“小品积习”与明季文风之同时，对“纤佻”辨析入微，扩大了小品作家、著作研究的界面，落实了小品文风研究的对象与广度；其小品批评凸显的两个具有符号意义的人物为屠隆和陈继儒，所揭示的晚明小品史可以为文学史改写提供重要参考；以“词气”“文格”定著作时代、作者真伪，不仅文学研究向来不受重视，在《总目》研究中亦受忽略，《总目》小品文风判断法虽有纰漏，但作为一种批评方法对文学风格批评的运用与丰富值得关注。在文献、认识、方法等方面，《总目》小品批评具有启示意义。

关键词 四库全书总目；小品批评；明代子部；启示意义

小品，不仅是明代一种标志性文体，还是明代一种标志性文化。以此而言，明人小品实已超出文体而进入文化的范畴——思想、文化的小品化进而深刻影响于著述或文学创作，由此造成了经、史、子、集的小品倾向，这显然已不止是文体范畴的小品而为文化范畴的小品了。疏理相关学术史，作为文体的小品其研究已属多见，文化范畴的小品今虽罕见考察，但追溯渊源则 200 多年前作为清代官学目录集大成的《四库全书总目》（下文简称《总目》）已开创先声。《总目》至少近 40 次直接用到“小品”概念，间接涉及的更是不乏其例。《总目》小品批评的显著特点是，它并非只针对小品文，而是四库各类著作皆有涉及，其中尤以子部为突出，时代则以明代为最。认为经、史、子、集的小品倾向，使明代特别是晚明著作出现了一种由小品带来的文化症候——著作者缺乏严肃的思想态度，以游戏为闲文，恣才情于消遣，掉弄聪明，务求新奇，不避俚俗浅陋，好尚纤仄佻巧，一时风气相高，泛滥成习。“明季说诗之家，往往簸弄聪明，变圣经为小品”^[1]，即是说儒家经典阐释在晚明出现了小品化特征；《广月令》“好取新奇，转成浅陋……亦不出明季小品习径也”^[2]，《测史剩语》“附以拟书三篇，连

珠杂说各十篇，则小品伎俩矣”^[3]，则指史部深受小品浸染；《画禅室随笔》“皆小品闲文，然多可采”^[4]，《遵生八笺》“专以供闲适消遣之用……不出明季小品积习”^[5]，则是子书“小品化”的体现；《萃川集》“皆其里居之时与人尺牍，益为小品矣”^[6]，《涟漪堂遗稿》“未附杂言数十条，皆谈理之语，颇近陈继儒小品”^[7]，即指别集受到小品风气影响。把小品当作一种书写风格和文化品趣，在经、史、子、集大视野来审视它，《总目》的角度有其独到之处。但从现有研究状况来看，《总目》小品批评向来关注者不多。仅有吴承学《晚明小品研究》涉及《总目》对晚明小品的相关批评^[8]，璩龙林、谢谦《〈四库全书总目〉视野中的晚明小品文》就“晚明小品文积习四态”等方面做了初步考察^[9]。二者的研究慧眼独具，但吴著并非重在研究《总目》小品批评本身，璩、谢之文只涉及《总目》小品批评的几个侧面，共同特点是立足于晚明小品文的视角来讨论《总目》小品批评。而《总目》一方面其小品批评对象并非只针对晚明小品文而是包括经、史、子、集各类著述，另一方面其小品批评是把小品作为一种书写风格或文化品趣来审视，体现的是小品文化观照，并非只作为一种文体来对

待。因此,《总目》小品批评研究仍有重要的开掘空间。

一 渊源与内涵

何谓小品?通过疏理小品之渊源,《总目》大体确定了小品的基本内涵。《总目》注意到小品兴起实乃文化风尚所致,这一思路使它对小品的理解能渐臻深入。将小品与古代文人的“清谈”之风联系起来,即是从文化学理解小品的可取路径。在《总目》中,小品有时被视为清谈产物,渊源直接追溯到南宋周密《澄怀录》,并由此上溯到南朝刘义庆《世说新语》。《澄怀录》提要明确阐述了这一脉络^[10],不过作者周密自序并没有说到《世说新语》的影响,而是提到与吕祖谦《卧游录》的直接关系^[11]。《澄怀录》之渊源,形成两种不同说法:一是《卧游录》,乃周密自说;二是《世说新语》,即《总目》之说。按理说,《总目》应该采用周密自说,为何舍而不取呢?这与《总目》官学性质相关。《总目》需要准确传达清代官学的思想,这使某些提要不得不带上“思想制造”的烙印。《澄怀录》提要就不免要做“微言大义”的文章:提到《世说新语》,是为了给小品渊源与“清谈”风气相架接;不提《卧游录》,则将小品与宋儒吕祖谦之关系拨离开。一箭双雕的同时还明显表达了对小品的贬斥态度——小品源自“清谈”,于小品发源史来说不无道理,但在《总目》中还有一层更重要的意思是对小品的贬低定位。因为“清谈”之风自魏晋以后常遭批判,《总目》谓“明人喜摘录清谈”就明显流露贬意,又谓“视刘义庆之专尚清谈者不同”^[12],既是对“清谈”的否定,也是对刘义庆《世说新语》的不满,尽管也有不当“绳之以史法”的回护^[13]。

《总目》遮蔽《澄怀录》《卧游录》的关联,旨在撇开与官学心目中的“纯儒”吕祖谦间的干系,意即纯儒是绝不会或不能“摘录清谈”或“专尚清谈”的。恰是这种官学逻辑,于贬低小品地位之同时,也就遮蔽了小品的另一层重要内涵——“澄怀”。

《卧游录》与《澄怀录》同入《总目》杂家类存目,因其小品性质有碍于吕祖谦“纯儒”形象,就有了所谓“明人依托”说^[14]。但周密自序明确

提到他的《澄怀录》原乃附于吕祖谦《卧游录》之“卷末”。又据《卧游录》首则内容,知吕、周二书一名“卧游”,一名“澄怀”,皆从宗炳“唯澄怀观道,卧以游之”的名言中来^[15],堪为姊妹篇。《总目》将这些信息遮蔽了,但“明人依托”之作怎么会让宋代周密读到并续写呢^[16]?这种错误,在于执意“祖谦必不如是之陋”,把“在南宋诸儒之中,可谓衔华佩实”的吕祖谦尽可能树立成“词多根柢,不涉游谈”^[17]的人物,主观认为“参差不伦,了无取义”的著作不可能出自他的名下。

把《澄怀录》说成“《世说新语》之流别”,其实隐含对《卧游录》《澄怀录》内在关系的认可。其逻辑关系是,《卧游录》“前二十一则全录刘义庆《世说新语》”,而周密自序说《澄怀录》是继《卧游录》而作,即《世说新语》影响了《卧游录》,《卧游录》又影响了《澄怀录》,“《世说新语》之流别”的说法也就能成立。可见,四库馆臣看过周密《澄怀录》自序,只是有意跳过《卧游录》这一环,从而把吕祖谦与“清谈”小品的关系隐藏起来。这种做法还被贯彻到讲小品渊源的大视野——《总目》以“清谈”小品之远源出自刘义庆《世说新语》,近源出自周密《澄怀录》,“明人喜摘录清谈”便是自这一近一远的源头而来。把《澄怀录》视为“清谈”之作,《总目》在周密《浩然斋雅谈》提要再次提到^[18]。《总目》还认为,《世说新语》和《澄怀录》作为一种著述范式为后世承袭,《舌华录》为“《世说新语》之余波”^[19],《古今韵史》为“《世说新语》之支流”^[20],《元壶杂俎》“大致欲仿沈括《清夜录》、周密《澄怀录》之体”^[21]。这样,从南朝到宋、明就形成一条以“清谈”为特色的小品脉络。

但《卧游录》《澄怀录》被作为“清谈”小品,事实上是对二书性质的误判,这对有关小品源流的两个关键造成了遮蔽:一是小品的重要内涵——“澄怀”,二是这种内涵的代表人物——宗炳。与其说《卧游录》《澄怀录》是“清谈”小品,倒不如说是“澄怀”小品。从著述动因来说,二书显然是“澄怀”而非“清谈”,因其主旨明确归于宗炳“澄怀观道,卧以游之”的情怀。宗炳的“卧游”对士大夫影响深远,而其“凡所游履皆图之室”的做法到了吕祖谦、周密就由“图”演变成为一种内涵

特别的文字，或即可称之为“卧游文学”。王深源谓吕祖谦“因有感于宗少文卧游之语，每遇昔人记载人境之胜，辄命门人随手笔之”^[22]，周密云“澄怀观道，卧以游之……名之曰‘澄怀’”^[23]。从宗炳到吕祖谦、周密，从卧游图画到卧游文学，“人境之胜”为其对象，“卧游”为其方式，“澄怀”为其目的，《卧游录》《澄怀录》为其结晶。说《卧游录》“了无取义”、《澄怀录》“摘录清谈”，误读了二书宗旨，也错定了小品源流——它们并非“清谈”小品之滥觞而为“澄怀”小品之代表。

《总目》关注的另一小品脉络源自于晚唐陆龟蒙“杂文”，此即通常所说的小品文。《笠泽丛书》提要将皮、陆并提^[24]，后来鲁迅的著名论断——“看他们在《皮子文藪》和《笠泽丛书》中的小品文，并没有忘记天下，正是一塌胡涂的泥塘里的光彩和锋铓”^[25]，亦或继承了《总目》说法。说陆龟蒙“杂文”多为“小品”，《总目》用到“闲情别致”一词概其意趣，并以皮日休文做比较，与其“时标伟论”相区别。这种以“闲情别致”为特色的小品与“清谈”“澄怀”的小品不同，乃另一支流。

写“闲适之趣”而又文风“纤仄”的小品，《总目》认为肇端于宋陈直撰、元邹铨续增《寿亲养老新书》^[26]。《总目》归为“医家类”，何以成为“明季清言小品”之“滥觞”？这是因为该著“叙述闲适之趣”且“词意纤仄”。古代医学倡医、养一体，常将文人情趣引入养生之道，含有养生内容的医书也就带上文人情怀和文学趣味，并由此架起医学与文学的桥梁。说《寿亲养老新书》“叙述闲适之趣”应无不妥，其《春时摄养》篇一方面紧扣“寿亲养老”主题，另一方面“放意登眺”“以快其意”云云^[27]，显然是一种文人情怀的投射。

“明季清言小品，实亦滥觞于此”，影响所及最直接的就是明高濂的《遵生八笺》（“遵生”又作“尊生”）^[28]。与《寿亲养老新书》偏重于医学相比，《遵生八笺》内容更丰富，《总目》归之于杂家而非医家。该著成书于明代性灵思潮盛行的万历时期，“闲适之趣”大大增强。特别是“四时调摄”部分，后被单独辑为《四时幽赏录》，堪称明人小品代表作之一。春如“孤山下看梅花”，夏如“苏堤看新绿”，秋如“西泠桥畔醉红树”，冬如“湖冻初

晴远泛”^[29]，无一不体现所谓“幽赏”境界，而其“幽赏”犹如宗炳的“澄怀”一样，内则诗化文人之情怀，外则赋予山水以灵趣，由此生成一种别有洞天的小品文学。可以说，“幽赏”正是晚明性灵小品的内在精神或思想灵魂。对“幽赏”小品之渊源，《遵生八笺》提要已有独到认识，但所说“遂为陈继儒、李渔等滥觞”^[30]，倒不如说对张岱的影响更突出，其《西湖七月半》等正是“幽赏”小品之典范。宋之陈直，元之邹铨，明之高濂，明末清初之陈继儒、张岱、李渔，小品的又一支脉络便清晰可见，其特点是内容由闲适而幽赏，文风则以纤仄为尚。

小品从文风而言另有“俚偶”一支，《总目》认为滥觞于南宋施清臣《几上语》《枕上语》^[31]。施清臣自序足以证实，诸如“合老释以非三，融精粗而为一，聊自警也”^[32]，亦即《总目》所言“宗二氏之旨，而以儒理附会之”，这是二书作为小品的内在灵魂——在思想上融合释、老，会通三教，具通达之精神、灵慧之心智。作者特别提到为病中“排遣”之作^[33]，其著述缘起及情境显示的恰是典型的小品心态。至于“词多俚偶”，又确为二书文字的显著风格，即“雨虹光烛，断灭虚空；纸鸢飞扬，偏侧易堕”^[34]之类。这与明代吕坤《呻吟语》、洪应明《菜根谭》等同归于“清言”一体显然毫无问题，只是明代清言的思想更具自由火花，甚至不无异端色彩，语言也更灵透活泼、清新有趣。但南宋后期的施清臣已算得上一位清言小品的代表作家，开了明代清言之先河。

《总目》还注意到小品的特殊类别，此在论述元末明初杨维桢之史著《史义拾遗》时提及。该著史著性质被质疑，原因与小品有关^[35]。依此说，则小品家族中还有一类史著小品，其特点是“借题游戏，无关事实”，这与鲁迅说小品“讲小道理，或没道理”^[36]有相通之处；另一特点是“非文章之正格，非史论之正格”，所谓“正格”即是严肃的史著，“非正格”则是游戏的史著。在元末明初，这种“非正格”的小品史著并不少见，“王祎集中亦多此体”，又说“盖一时习尚如斯”，可见史著小品化现象影响很广。到了晚明，此类史著更是不乏其例，如钟惺《史怀》“掉弄聪明”^[37]，冯士元《测史剩语》“小品伎俩”^[38]，宋存标《史疑》

“措语尤多轻佻”^[39]，昌起宗《拙存堂史括》“盖文士闲居，姑以资谈柄、消永日耳”^[40]，佚名《尚论编》“每篇皆有跋语，亦佻巧无可取”^[41]等。这为了解史著小品化倾向提供了一个新的视野。

梳理小品渊源之同时，《总目》基本定义了小品的内涵。大致梳理如“簸弄聪明”“好取新奇”“清谈”“游戏”“闲情别致”“闲适消遣”“闲适之趣”“佻纤尖巧”“纤仄”“伧偶”等，以及通过《总目》进一步发掘的“澄怀”“幽赏”等，触及了小品作为一种文格以及一种文化的内外特征，这对理解小品特别是晚明小品大有助益。

二 “小品积习”与明季文风

“小品积习”与明季文风既有某种等同关系又互为因果，故《总目》因不满“小品积习”而痛贬明季文风，又因深恶明季文风而极斥“小品积习”。明季文风引起的官学焦虑使馆臣批判“小品积习”的态度和肃清“小品积习”的愿望表现得尤为突出。“佻纤尖巧，亦不出明季小品习径”^[42]，“宋谱‘福业’诸说，不脱明人小品习气”^[43]，“多涉佻纤，不出明季小品之习”^[44]，“惟下语颇涉纤仄，尚未脱明季小品积习”^[45]，“多涉纤仄，不出明季小品积习”^[46]，“相其文格，亦全类明万历以后清言小品之蹊径”^[47]，“不出明人小品之习”^[48]，“犹沿明季陈继儒等小品之习”^[49]，“大抵不出明人小品之习气”^[50]等，意味着明人小品由来也久，其波及也广，其沾染也深，《总目》之所以痛斥这种文体及文风正是在此。

《总目》小品批评的立场，取决于它对小品所体现的文风特征和文化趣向的根本否定，特别是对晚明文风和晚明文化的根本否定。璩龙林、谢谦《〈四库全书总目〉视野中的晚明小品文》以“纤佻”“芜杂”“伪袭”“浅陋”为“晚明小品文积习四态”作过分析^[51]，但与《总目》对小品文风的概括出入较大。今考《总目》直接谈到“小品”文风的提要共十余则，“四态”中的“芜杂”“伪袭”“浅陋”并未提及，可见《总目》并不以“芜杂”等“三态”为小品文风。《总目》讲到小品文风主要是“纤佻”。《几上语 枕上语》提要谓“词多伧偶。明人小品，

滥觞于斯”^[52]，则“伧偶”也属小品文风的特征之一。《唾居随录》提要云“又多为对偶长联，犹沿明季陈继儒等小品之习”^[53]，“对偶长联”指的也是“伧偶”。至于“芜杂”“伪袭”“浅陋”，则非《总目》论小品文风的描述。

《总目》认为，晚明小品标志性的文风是纤佻，而纤佻文风极具否定意义。纤佻就其实质是一种带有小品性质的文风，小品愈发达则此种文风愈盛行，在即是纤仄、佻巧文风寄身之所。故《总目》对其批判不遗余力。单以明代子书言，此种文风几乎到了泛滥至极的地步：“纤仄”如黄鹤《倦居谱》等，“纤佻”如张介宾《景岳全书》等，“纤巧”如安世风《燕居功课》等，“纤丽”如贺贻孙《激书》等，“纤诡”如徐达左、高阳《颜子鼎编》等，“纤俗”如陈士元《梦林玄解》等，“佻纤”如陈继儒《岩栖幽事》等，“佻巧”如陈汝铸《甘露园短书》等，“佻薄”如乔可聘《读书札记》等，“佻浅”如郑瑄《昨非斋日纂》等，“佻荡”如佚名《缥緲对类》等，“僇佻”如彭汝让《木几冗谈》等，“僇薄”如陈霆《山堂琐语》等，“轻僇”如谢肇淛《文海披抄》等，“轻薄”如董其昌《画禅室随笔》等。所列之著涉及子部之儒家、医家、术数、艺术、谱录、杂家、类书、小说家，尤以杂家为多。这真实反映了明代特别是晚明著述小品化现象的异常突出。

所谓“纤”“佻”“僇”“薄”等小品文风，不同著作有各种各样的体现。《总目》考察小品文风的细微以及官学对文风“把关”之严，皆由此可见。但客观上又有助于认识所谓“小品积习”和明季文风的具体情形：（一）命名。《总目》认为，《颜子鼎编》“即其命名，亦明季纤诡之习也”^[54]，原因在于《总目》把追新求奇、自出己意看作明季文风的弊端，“鼎编”之名才被认为有问题。徐懋升《留留青》，《总目》斥其“标目已为纤佻”^[55]。作为医书的《景岳全书》则以书中四维、八阵等“其命名皆沿明末纤佻之习”而遭斥^[56]。该著提要主要内容取自《景岳全书》作者外孙林日蔚之跋^[57]，馆臣未暇细读原书而袭取此跋，故不免捕风捉影。事实上，“八阵”说（分“新方八阵”“古方八阵”）见于原书卷五十至六十，“四维”“良相”“良将”说见于卷四十八《大集·本草正上》^[58]，原意不

过比喻而已,以使药学思想更明白易懂,本无问题。(二)立意。如谓陆奎章《香奁四友传》“盖仿韩愈《毛颖传》而作……皆词意儇薄,了无可取”^[59],韩愈《毛颖传》以涉思奇诡称,《总目》有多处贬评,此之不满即在仿其立意。(三)用语。这是对语言风格的批判,如谓王稚登《吴郡丹青志》“各为传赞,词皆纤佻”^[60],姚旅《露书》“词气儇薄,颇乖著书之体”^[61]。(四)综合。包括命名、内容、意趣、风格、语言等,如评吴从先《小窗自纪》《艳纪》《清纪》《别纪》“总明季纤诡之习也”^[62],一个“总”字,是“四纪”的综括,言其都不出小品风气。(五)小品集。如闵景贤、何伟然所编《快书》“割裂诸家小品五十种,汇为一集”,故曰“大抵儇薄纤佻之言”;何伟然编、吴从先订《广快书》在初刻《快书》五十种后“又以五十种广之”,故曰“《快书》百种,最下最传,盖其轻儇佻薄,与当时士习相宜耳”^[63]。(六)局部或附录。其部分内容或附录体现了小品文风,如陈士元撰、何栋如重辑《梦林玄解》“辞气纤俗,盖术家依托之文”^[64],指的只是书中孙奭一序。此例恰可说明《总目》对文风审查之苛严,凡细节、微观之处亦不轻易放过,贯彻“敦崇风教,厘正典籍”^[65]的思想完全到了无所不及的地步。

在文学上,以“纤”“佻”“儇”“薄”为特点的明季文风之代表被《总目》认为是公安、竟陵之派。如《尧峰文抄》提要曰“纤佻于三袁,至启、祜而极敝”^[66],《帝京景物略》提要谓刘侗“多染竟陵之习,其文皆么弦侧调,惟以纤诡相矜”^[67],《燕峰文抄》提要评费密“不涉袁、钟之纤仄”^[68]等等。小品文风不限于诗、文、词、曲等,在集部之外的经、史、子各部亦有传播。由此看来,公安、竟陵文学影响之大的土壤便可呈现。文风决定书写风格,也体现文化趣向。在清代官学看来,文字带有谁家风格,也就自然成了谁家文字。所以,文风问题在代表官学思想倾向的《总目》中非同等闲,文风批评也成为《总目》小品批评的重要内容。

三 具有符号意义的两个人物

《总目》小品批评,有一个重要视点就是小品

风气的代表人物。这使其批评有了更明确的针对性,或者说有了借以发力的具体目标。小品在明代产生了一些影响很大的代表人物,形成了一种传播力很强的文风。从官学立场看,这极大地败坏了正统的文体文风和士风士习。这其中有两个人物尤其引人注目,一是屠隆,另一则是陈继儒。在《总目》视野中他们就是具有符号意义的人物,诸如“盖屠隆一派”^[69]、“陈继儒等之派”^[70]、“明代陈继儒一派”^[71]等,其影响之大可见一斑。

《总目》显示,屠隆是晚明小品文体文风的实际践行者、推动者和奠定人。在那场风靡一时的晚明小品热潮中,屠隆起到的作用非同一般。恰因如此,《总目》特别注意到了屠隆在晚明士风及文风中所扮演的角色。一方面他是《总目》中与陈继儒并称为晚明小品的主要代表人物;另一方面他还是《总目》以一个代表人物命名为晚明小品流派的第一人。《总目》称“屠隆一派”,又称“屠隆《鸿苞》之派”,前者是指“是编乃札记清言,儇佻殊甚”^[72],后者针对的是“不出明人掉弄笔墨之习”而又“中多阐扬佛教”^[73]。其中“《鸿苞》之派”单以书名命派,足见该著的地位和影响力不同凡响。屠隆之友张应《鸿苞居士传》载其晚年著《鸿苞》而称“鸿苞居士”,“其书以参合三教为本,网罗宇宙古今”^[74],黄汝亨《鸿苞序》谓“析天人,研性命,剖两仪,纬万类,渔猎诸子,网罗百家”^[75]。屠隆辞世前有偈曰:“生平一过,多言多语。《鸿苞》等书,付之一炬。”^[76]可见,一生最在意者其著述而已,著述之最系怀者《鸿苞》而已。但《总目》在意的是该著“网罗百家”“参合三教”,深深带上了晚明的时代烙印,所谓“屠隆《鸿苞》之派”即此。

在《木几冗谈》《说储》二书提要中,《总目》的批判分别指向屠隆的文风和思想两方面,并触及屠隆小品的几个要素或特征:著述形式为“札记清言”,写作态度“不出明人掉弄笔墨之习”,思想上“多阐扬佛教”,文风上“儇佻殊甚”。这些都是《总目》以清代官学态度认为不可取之处。正因如此,《总目》提要也就成了清代官学肃清屠隆小品影响的阵地。今发现在卷一二八中,一个最引人注目的名字就是屠隆,出现在同卷提要

中的还有李贽、焦竑、董其昌、陈继儒等，而这些人即是《总目》认为对晚明思想和文风产生了深刻影响的重要角色。卷一二八是明、清杂家类“杂说”存目著作的提要，而“杂说”的著述性质按《总目》卷一二二案语可理解为一种随意性、自由性乃至开放性程度很高的文类，故其衍生能力也特别强劲，宋代以后盛行一时，明代则尤为发达^[77]。而屠隆作为明代杂说的标志性作家，不仅带动了“杂说”之写作，而且促使“杂说”向“杂”进一步演进。这种作用既包含文风方面，更体现于思想方面。如果说其文风在当时及此后具有某种像传染病一样的影响力，那么更让清代官学警惕的是他还为这种文风提供了思想启动力。所以，作为重点人物出现的屠隆往往又与李贽相提并论。这无疑是屠隆影响力之大的一种体现，还可以说明其思想与李贽一样具有极大的消极性和破坏力。“所推重者李贽，所规摹者屠隆也”^[78]之说，便坐实了屠隆与李贽做为士林领袖具有相提并论的重要性。而《读书杂记》提要亦对屠隆和李贽痛下针砭，言下之意只要生在明末，被李贽、屠隆习气之沾染即成为必然^[79]。这样，屠、李二人就成了一代风气的主宰者和引领者。《祝子罪知录》提要引王宏撰《山志》“乃知屠隆、李贽之徒，其议论亦有所自，非一日矣”^[80]等语，原文见于《山志·初集》卷六，馆臣做了删节，大意未变^[81]，只是更符合《总目》的思想主旨。《罪知录》“综是非之案断而命曰‘罪知’”^[82]，思想上的确具有颠覆性，如谓“汤武，非圣人”^[83]，“孟轲纵横者流，不可谓贤人”^[84]等，开了后来李贽“颠倒千万世之是非”^[85]之先声。从祝允明到屠隆、李贽，代表了明代思想和文风离经叛道的一路。《总目》所引《山志》，说明屠、李并称而遭斥在《总目》之前已有清初思想家王宏撰持此一说，《总目》袭取之并肯定“其说当矣”^[86]，表明对王氏论断明确赞成，且正式转化为清代官方的看法。再有论明代诗文作家陶琰及其《仁节遗稿》“不出李贽、屠隆旧习”，这又体现出李贽、屠隆在诗文领域的影响同样广泛而深刻，特别是与“其学以佛为宗”完全一脉相承^[87]。

总之，屠隆与李贽可谓是形成时代潮流和风气

的关键人物。当然《总目》对二者的整体评价又有根本区别，李贽的危害性、否定性远比屠隆大得多。《总目》对李贽的定论是“其人可诛，其书可毁”^[88]；对于屠隆，其批判有不同分寸，较为集中的评价为“其言放诞而驳杂……大旨耽于二氏之学，引而驾于儒者之上……盖李贽之流亚也”^[89]，或谓“隆虽佻荡不检，游谈无根，然其谬尚不至此。殆坊贾所托名也”^[90]，“隆虽纵诞之士，不以学问名，然其陋不应至是，必书肆伪托也”^[91]。总之，屠隆虽属“李贽之流亚”“纵诞之士”，但还不像李贽那样罪恶滔天。当然，从《总目》评陈禹谟“但不至如隆之放恣耳”^[92]来看，屠隆的“放恣”也非一般人可比。陈禹谟、屠隆、李贽，便构成明人思想气质演变、思想叛逆程度递增的轨迹。

《总目》中的明人小品作家比屠隆更具代表性的人物是陈继儒。他的名字作为一种文风的代称被反复提及，诸如“明代陈继儒一派”“盖陈继儒《珍珠船》之类”“盖亦陈继儒《秘笈》之类”“犹陈继儒诸人之习气”“颇染陈继儒之俗格”“颇近陈继儒小品”“沿陈继儒等之余习”“不过陈继儒之流耳”等。就文风批评来说，这首先是源流问题。评宋代倪思及其《经锄堂杂志》“其学杂出于释老，务为恬退高旷之说……明代陈继儒一派，发源于此”^[93]，则该派文风的源头可追溯到南宋。论明清之际王象晋《清寤斋欣赏编》“皆摭明人说部为之，犹陈继儒诸人之习气也”^[94]，可见该派之流脉一直延至清初。这便大致可以拉出小品著述及其文风的一条历史线索。其次是评价问题。《总目》批评是一种“严褒贬”“衡是非”^[95]的官学批评。当某一文人及其著述被《总目》贴上“陈继儒一派”的标签时，就意味着将其文风归到了“俗格”加以贬低。与屠隆的情况不一样，《总目》提到陈继儒往往与其“明季山人”的身份密切相关，字里行间充满了正统官学对待山人的鄙弃和轻蔑。所谓“强作清言”“强作雅态”“不儒不释”“体例驳杂”“标目诡异”等，在代表皇家身份的政治权贵和文化权贵看来，其山人姿态是那样装腔作势、引人发笑，其思想是那样缺乏官学的纯正而显得不伦不类，其著述的体例、标目也都是那样不成规矩、面目怪异。《总目》把“陈继儒之浅陋”与“李贽之狂谬”提

到同样的位置痛加批判，可以认为，在清代官学眼中晚明两种最具危害的士风和文风之一就是包括陈继儒及山人文化之“浅陋”。当然，《总目》对明季山人文化的谨慎，主要不在其作“清言”、弄弄“雅态”，还有一个不可忽略的方面就是山人行为和思想的放诞。这就是《总目》将陈继儒与李贽、屠隆、袁宏道等置于同等地位加以批判的深层原因。

四 作为方法的小品文风判断法

小品文风，在《总目》中成为区分时代文化品格的标尺，同时也成为把握著作时代、内容或作者身份并做出批评判断的凭借。这种小品文风判断法，其特点是以虚证实，不仅与清代实学精神相悖，且一经还原事实便粗陋难掩，成为《总目》方法论上的一项软肋。前所辨《卧游录》“明人依托”说，即由“其言参差不伦，了无取义，祖谦必不如是之陋”的主观推想得出，是《总目》以小品文风判断著作年代、作者而致误的典型例子。

无独有偶，《颜子鼎编》《钱子测语》二书提要，都以小品文风来判断著作成书年代的重要线索，对二著的批评也建立在此基础之上。以《钱子测语》为例，判定“不出明人小品之习”，即是据其“体裁”得出^[96]。问题是，作者钱琦为正德三年（1508）戊辰科进士，生活的时代主要为正德、嘉靖时期，而《总目》的逻辑是“正、嘉时人犹淳实无此佻薄体裁”，只有“隆、万间伪体盛行”才有可能产生这种“佻薄体裁”之作，从而主观假设《钱子测语》并非钱琦所撰，而是“其子孙”受到隆庆、万历“风气”影响的“伪托”之作。其勉强作为依据的仅仅是书末钱琦之孙钱孺谷跋中提到“昔眉公陈先生手牍索览”之语。疑惑在于：（一）作者究竟是钱琦还是他的子孙，确切证据是什么？（二）写作时代究竟是正、嘉时期还是隆、万以后，是否仅以文风可做判断？（三）正、嘉时期的著述是否一定不能“佻薄体裁”的出现，只能是隆、万以后才有此文风？（四）“昔眉公陈先生手牍索览”是否只能是隆、万以后的著作，此前的著作就不能“索览”吗？这些问题无不因简单使用文风判断法而生。

小品文风判断法，在《总目》中有广泛运用。

如判定宋许棐《樵谈》“然核其词气，如出屠隆、陈继儒一辈人口，殊不类宋人之作”^[97]，这个推断由提要开头一句“旧本题宋棐撰”而来，言下之意是旧题宋人许棐所作的《樵谈》疑为明人所做，但这个推断并非考证所得，仅仅是用了一种叫“核其词气”的方法，什么“词气”呢？就是“出屠隆、陈继儒一辈人口”的小品词气。元代刘君贤《学问要编》，《总目》用同样的方法提出“明万历以后”伪托或窜乱的假说^[98]，其方法也不是考证，而是“相其文格”，与“核其词气”如出一辙。在判断《樵谈》《学问要编》作者朝代的时候，《总目》的基本逻辑是相同的，即认为宋人不可能有《樵谈》的“词气”，元人不可能有《学问要编》的“文格”，这种“词气”“文格”只能是明人特别是明代万历以后才有的，甚至做出“元人敦笃，无此体裁”之类的判断。问题很明显，难道元人就人人“敦实”，明人却个个虚骄不成？这种绝对思维在没有文献考证支撑的情况下显得尤其武断，同时也给《总目》留下了有待解决的悬案。以《樵谈》为例，元末明初叶子奇《草木子》就引用了书中内容^[99]，且所引内容皆见于《樵谈》中，只是文字略异，顺序稍有不同^[100]。那么，由元入明的叶子奇已经见到的书怎么会“出屠隆、陈继儒一辈人口”呢？所以，《总目》以“词气”即文风来判断作者和著作时代极不可靠。再有《观生手镜》，“旧本题蘋川布衣编”而“不著名氏”，《总目》认为“必万历以后人作”，作者当为“明末山人”，而其依据仅仅两点：一是“所征引至明代而止”，二是“其诗论不甚谬，而词气儇薄”^[101]。前者根据的是书中材料，但并不确切；后者根据的只是文风，更不能由此而做结论。这种方法的局限性在张应文《张氏藏书》提要同样有所显现。《总目》叙录其著《清秘藏》《张氏藏书》两种，但二书提要皆未及张应文的生卒年，忽视了他的生活时期。《张氏藏书》提要先是定其论著“大抵不出明人小品之习气”，然后便大发一段宏论，把张应文著中的问题在时间上归到“明之末年”，并把账算到屠隆、陈继儒头上，以为此二人“不得不任其咎”^[102]。实际上这完全是疏忽大意，因为屠隆、陈继儒都是张应文的晚辈，时代先后

完全被颠倒。

小品文风判断法有时或为一种削弱某一人物及著作影响力的官学策略。这种推测从官学动机来判断是不无可能的。有数种旧题屠隆所撰著作在毫无考据的情况下被《总目》判定为“坊贾所托名”或“书肆伪托”之作。在明代虽然坊间伪托的现象司空见惯，但《总目》在此所持“伪托”说却另有用意。《缥緗对类》的特点是“皆市井幃轴之词。其首载习对歌之类，尤俚陋可资笑噓”，《总目》也就宁可认为“隆虽佻荡不检，游谈无根，然其谬尚不至此，殆坊贾所托名也”^[103]。另如《翰墨选注》，《总目》亦断然指出“隆虽纵诞之士，不以学问名，然其陋不应至是。必书肆伪托也”^[104]。这样做虽然并无文献考证依据，但完全可以借重官学的权威来割裂作为名流的屠隆与二书的关系，大大消减“尤俚陋可资笑噓”“谬妄不可殚述”的低俗小品文化的影响力。作者考证的问题没有解决，但官学所需要的意图则大体可以实现。

《总目》还将小品文风作为某一著作流派归属的判断依据。《读书止观录》提要，没有把作者吴应箕最具标志的身份——复社名士作为其著作思想倾向与文风特征讨论的基点，而是以其“语意僂佻”来判定它“颇类明末山人之派”，而所谓“明末山人之派”指的就是以山人领袖陈继儒为代表的一派文风，故馆臣梳理了《读书止观录》的渊源，得出“是书乃袭陈继儒《读书十六观》之余绪，推而衍之”的结论。在此虽也提到“明末称复社五秀才，应箕为首”^[105]，但话题主旨另有所指，立论的核心落到陈继儒及其山人文风，复社话题则未做丝毫展开。这样做在思路上就是先做文风判断，进而确定流派属性，以此立足生发评论、展开书籍批评。在此无疑可以看到文风判断法作为方法论所起的作用。

五 启示意义

20世纪以来，小品特别是晚明小品一度成为学术热点，但不论是民国小品热还是改革开放以后的小品研究，都与《总目》小品批评有较程度的脱节，研究的“断裂”现象显得突出。新的研究应当重视20世纪以来小品研究与《总目》小品研究

的离合问题，推进小品的传统研究与现代研究由离而合。为此《总目》小品批评的意义理当倍受珍视。

首先，文献启示意义。学术研究往往以文献为基石，在文献对象未经圈定、文献基础未能确立、文献边界未弄明晰的情况下所进行的研究，往往都带有很大随意性、局限性，这是目前小品研究的又一缺憾。对此，《总目》小品批评恰恰对我们裨益良多：它直接提供了可资研究的小品文献线索，按此线索把相关文献加以辨别并汇集起来就能形成一个有益的著作名录。《总目》直接提到“小品”的，至少达数十部之多。没有直接提到但间接可以确定为小品的文献通过梳理也不难确定。《总目》以屠隆、陈继儒为小品代表作家，那么二人著作或托名之作以及“出屠隆、陈继儒一辈人口”“所规摹者屠隆”“大抵轻佻纤巧，沿陈继儒等之余习”^[106]等著作理当算入小品之列，至少又有20多部。再如前文关于小品“纤佻”文风涉及的文献亦为数十部。几个部分合起来并去其重复则有百部之众，而这还远不是由《总目》可以梳理的小品文献之全部。可见，《总目》提供了小品研究广大的文献视野。借助《总目》，既可按部类分别整理古代的经部小品、史部小品、子部小品、集部小品文献，也可以按时代整理各个历史时期特别是宋、元、明、清小品文献，从而为中国小品文献整理与研究的系统工作打下基础，并在此基础上推进小品史的研究与书写。随着庞大的文献资源发掘，小品研究的视野将全面打开，相关研究也将有效拓展；而无限丰富的小品文献也给个案研究带来极大的学术空间。小品文献还可以延伸对相关文献的整理与研究，如“纤佻”文风的文献，对文学风格研究很有价值。今据《总目》明代子部就梳理了40多种，如果再扩展到经、史、子、集各部著作就能得出一个更大的文献量，这样“纤佻”文风及其风格史的研究将会得到重大突破。

其次，认识启示意义。《总目》提供的小品认识包括小品观、小品史、小品内涵等，对今天小品研究乃至文学史、思想史等研究能够提供有益启示。

《总目》小品认识能刷新小品观，促进小品史的梳理，深化对小品内涵的理解。经部有经部的小品，史部有史部的小品，子部有子部的小品，集部有集部的小品，这是值得重视的《总目》小

品认识。由经部小品、史部小品、子部小品和集部小品构成的小品世界，意味着在观念更新基础上小品史向着宏大空间的展开，也意味着小品内涵向着文化深层的延伸。小品研究的性质随将得到一次深刻变革。再如从“清谈”“澄怀”“闲适”“幽赏”“游戏”等探讨小品内在文化品趣，对促进小品认识的深化助益极大。小品何以兴盛，何以独具品格，便是种种文人趣尚、情怀为其本源，文人的这些趣尚、情怀愈活跃，小品也就愈发达。围绕其文化品趣的研究将有无限拓展的空间，必然引导对小品的深入辨析。

《总目》有助于考察一些作家在文学发展进程中所起的真实作用，重新确立其在文学史上的应有地位。像屠隆、陈继儒在现有文学史著作虽也较受重视，但其地位和影响或许远远被低估。《总目》让人了解到他们给当时和后来的文人精神及其著述沾染一种小品趣味或所谓“积习”，即其影响已不限于一诗一文，而是作为风气的传播和感染。当重写文学史时，就必然要考虑是否应将屠隆、陈继儒提高到与李贽、汤显祖和“公安三袁”同等地位来考察他们在文学史的真实作用。这无疑需要重新再现屠隆、陈继儒的文学影响，而这种再现实际上牵涉到晚明文学整体情况的重新考察和确切评估，也就是说文学史书写的状貌也将相应发生变化并以更本原的面目呈现在我们眼前。关乎文学史研究的另一个启示是，作为文学的小品，其身后还有作为经学、史学和子学的小品，文学小品并非孤立地存在于小品史上，而是有着千丝万缕的非文学因素为其背景或土壤，从而使它枝繁叶茂且意蕴深厚。

从思想史、文化史观之，《总目》对经、史、子小品化现象的揭示，给经学史、史学史、子学史研究的启发同样值得珍视。解经的小品化对儒家正统经学产生极大的解构作用，有损其纯正性、严肃性，但又促进了经学的分流而使其本身变得更具多样性，并催生一种个人化、自由性和趣味性的经学形态，从这个意义上讲反而增强了经学的生命力。史学、子学亦当如此。小品作为一种思想文化要素，不仅是一种态度，也是一种方法，还是一种话语方式。思想文化的小品要素，是社会不断发展进步的结果，同时也是人的个性化不断张扬的结果。循此

思路，既可以对中国古代经学、史学、子学和文学以新的审视，也可以对中国思想史、文化史以新的考察，而小品研究也因经、史、子、集以及思想史、文化史背景的全面疏理和把握而别开生面。

第三，方法启示意义。《总目》小品批评还可以从方法角度来理解它的意义。比如论“纤佻”，《总目》区分为纤仄、纤巧、纤丽、纤俗、佻巧、佻薄、佻浅、佻荡、僂佻、僂薄、轻僂、轻薄等，这种细致入微的做法是很少见的。借鉴它，可以深入研究小品纤佻文风，还可以将这种辨析方法运用于更广范围的文学风格研究。

《总目》研究本身的方法问题更值得重视。前贤对《总目》的考证，已订正大量疏误，但许多问题仍遗留书中有待发现和辨证。值得探索的是，研究中是否能总结一些具有方法意义的规律，再根据规律洞悉《总目》文献疏误的症结，让同类问题自然显露以便纠订。前文论及《总目》小品文风判断法用于考证作者及著作成书时代虽不可靠，而这种方法又是《总目》常用的，借此实际上能够获得一个规律性的认识——凡《总目》以所谓“核其词气”即以文风作为判断依据时或许就是其出现纰漏的地方。像《樵谈》提要用“核其词气”的方法，当以元末明初叶子奇《草木子》作为铁证时，它的结论则不攻自破。今发现，“核其词气”是《总目》惯用的一种判断方法，如谓“核其词气，似明万历以后人，盖贗托也”^[107]，“词气亦宛似奇龄”^[108]，“词气如出一手，似非其弟子所能”^[109]，“其序词气拙陋，殆出依托”^[110]，“其词气亦非近人所及”^[111]，“词气僂薄……必万历以后人作也”^[112]，“详其词气，当是一人”^[113]，“相其词气，实出一手”^[114]，等等。或用“文格”，亦属类似。如谓“文格略同，疑即小说家之《鬻子说》也”^[115]，“相其文格，亦全类明万历以后清言小品之蹊径。元人敦笃，无此体裁”^[116]等。通常的情况，这些地方即是《总目》有待再考证的问题点，而提供我们考察方法的正是文风判断法。除文献辨证外，在思想、学术与审美批评方面，文风判断法也给《总目》研究以方法上的启示。上述所举诸例有的不仅需要文献考订，同时在观念或观点上亦当辨证。包括《总目》提到的“小品积习”“小品之蹊径”以及“屠隆一派”“陈

继儒一派”之类，如把类似的评价汇集起来并厘清其关系，则对文学风格、思潮、流派等研究必然起到“辨章学术，考镜源流”的积极作用。

[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四库全书总目》子部提要考辨与学术批评还原研究”(批准号 17AZW012)的阶段性成果]

[1][2][3][4][5][6][7][10][12][13][14][17][18][19][20][21][24][26][28][30][31][35][37][38][39][40][41][42][43][44][45][46][47][48][49][50][52][53][54][55][56][59][60][61][62][63][64][65][66][67][68][69][70][71][72][73][77][78][79][80][86][87][88][89][90][91][92][93][94][95][96][97][98][101][102][103][104][105][106][107][108][109][110][111][112][113][114][115][116] 纪昀等：《钦定四库全书总目(整理本)》，第 189 页，第 922 页，第 1183 页，第 1633 页，第 1639 页，第 2485 页，第 2536 页，第 1731 页，第 1857 页，第 1836 页，第 1729 页，第 2129 页，第 2753 页，第 1745 页，第 1749 页，第 1745 页，第 2026 页，第 1339 页，第 1339 页，第 1639 页，第 1650 页，第 1175 页，第 1182 页，第 1183 页，第 1184 页，第 1184 页，第 1185 页，第 922 页，第 1559 页，第 1560 页，第 1561 页，第 1639 页，第 1651 页，第 1656 页，第 1678 页，第 1763 页，第 1650 页，第 1678 页，第 1249 页，第 1707 页，第 1361 页，第 1920 页，第 1515 页，第 1713 页，第 1921 页，第 1764—1765 页，第 1478 页，第 33 页，第 2343 页，第 1042 页，第 2523 页，第 1706 页，第 1697 页，第 1649 页，第 1706 页，第 1711 页，第 1636 页，第 1705 页，第 1711 页，第 1653 页，第 1653 页，第 2513 页，第 2463 页，第 1666 页，第 1817 页，第 2699—2700 页，第 1711 页，第 1649 页，第 1744 页，第 6 页，第 1656 页，第 1650 页，第 1651 页，第 1751 页，第 1763 页，第 1817 页，第 2699—2700 页，第 1750 页，第 2730 页，第 217 页，第 511 页，第 1207 页，第 1251 页，第 1347 页，第 1751 页，第 1752 页，第 1764 页，第 1564 页，第 1651 页，中华书局 1997 年版。

[8] 参见吴承学：《晚明小品研究》，第 447—452 页，江苏古籍出版社 1999 年版。

[9][51] 璩龙林、谢谦：《〈四库全书总目〉视野中的

晚明小品文》，《东南学术》2013 年第 1 期。

[11][23] 周密辑：《澄怀录》，上海师范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编：《全宋笔记》第 8 编(1)，第 91 页，第 91 页，大象出版社 2017 年版。

[15][22] 吕祖谦：《卧游录》，上海师范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编：《全宋笔记》第 6 编(3)，第 307 页，第 306 页，大象出版社 2013 年版。

[16] 胡玉缙认为吕祖谦有另本《卧游录》而非此本，失考。参见胡玉缙撰、王欣夫辑：《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补正》，第 1046 页，中华书局 1964 年版。

[25] 鲁迅：《南腔北调集·小品文的危机》，《鲁迅全集》第 4 卷，第 575 页，人民文学出版社 1981 年版。

[27] 陈直原著、邹铨增续：《寿亲养老新书》，第 13 页，人民卫生出版社 2007 年版。

[29] 高濂：《四时幽赏录》，丁丙、丁申编：《武林掌故丛编》第七册，第 4480 页，广陵书社 2008 年版。

[32][33][34] 施清臣：《东洲几上语》，上海师范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编：《全宋笔记》第 8 编(4)，第 126 页，第 126 页，第 133 页，大象出版社 2017 年版。

[36] 鲁迅：《且介亭杂文二集·杂谈小品文》，《鲁迅全集》第 6 卷，第 417 页，人民文学出版社 1981 年版。

[57][58] 张介宾：《景岳全书》，第 19 页，第 1275—1643 页、第 1232 页，人民卫生出版社 2007 年版。

[74][75][76] 屠隆著、汪超宏主编：《屠隆集》第 7 册，第 3 页，第 1 页，第 2 页，浙江古籍出版社 2012 年版。

[81] 参见王弘撰：《山志》，何本方点校，第 145—146 页，中华书局 1999 年版。

[82][83][84] 祝允明著：《祝允明集·祝子罪知录》，薛维源点校，第 649 页，第 653 页，第 663 页，上海古籍出版社 2016 年版。

[85] 李贽：《藏书世纪列传总目前论》，张建业主编：《李贽文集》第 2 卷，第 7 页，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0 年版。

[99] 参见叶子奇撰：《草木子》，第 72 页，中华书局 1959 年版。

[100] 参见许棐：《樵谈》，上海师范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编：《全宋笔记》第 7 编(7)，第 168 页、第 170 页、第 169 页，大象出版社 2015 年版。

[作者单位：西南大学文学院]
责任编辑：马勤勤